

此电子书由习之网 www.5sgou.com 搜集于互联网. 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 如要支持作者, 请购买正版

资中筠自选集(全五卷): 士人风骨-
作者: 资中筠

士人风骨 第一部分

自序(1)

本人忝列“学者”圈, 以笔耕为业, 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 多为“内部”报告, 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 也多为应景文章, 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说来，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 90 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 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

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说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这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

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 1928 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

“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竖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

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自序（2）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

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今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

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今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

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

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

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自序（3）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

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

“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

已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 GDP 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

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

“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

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

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X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国格与人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

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

关于我的履历

不知从何时起，我在公共场合被介绍身份时，主持人常提到“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有时还要加上“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起初我还不以为意，后来越来越感到不是滋味，于是有机会就要说明：我年轻时在外事单位工作，由于专业学的是外文，主要工作之一是翻译，重头是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间或也为一些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见外宾做翻译，但只占工作的一小部分，临时应命，绝非专任。那时候国家领导人并没有专门的翻译，只是有关部门掌握一个相对固定的各种语种的翻译名单，以便随时需要，临时召唤。在1959年至“文

革”之前一段时期，看来我被列入了这个名单，所以不时应召接受任务，平时就在本单位工作。如此而已。另外，既然做对外交流工作，接触的人中包括外国名人、要人，这也不足为奇。

最近做客“人民网”，关于我的介绍中又突出这一点。“天涯网”的介绍干脆把这作为我唯一的身份。我更感到有必要郑重说明，以免被误以为曾经是“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前几年有一本颇有影响的畅销书，作者在特殊年代曾任毛主席的翻译兼英语教师，在特殊的政治风云中曾红极一时，书中的自述情节对不明就里的公众说来颇“吸引眼球”，可能给不熟悉当代历史的人们一个错觉，以为曾

担任高层翻译，就必然关系密切，或地位特殊。因是之故，我更觉得有必要予以澄清，说明我不属于那一类人，也算是爱惜羽毛吧。在我所处的年月，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无论为谁翻译，只是一项普通的工作，最多说明在业务水平上得到一定的认可，但也不一定是最高水平，因为外文水平更高的，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何况此类工作只不过“用其一技之长”，不会因此显赫起来。

另外还有一层，我年轻时被分配做了十几年翻译，并非初衷。那时“此身非我有”，工作不是自选的。后来越来越感到厌倦，对因工作关系而得以见“大场面”，接近“大人物”，兴趣索然。旁人看来也

许以为值得羡慕，我却有庄子寓言中的“腐鼠”之感。所以改革开放之初刚可以有一点选择权，要求调工作不再算大逆不道，我就赶忙申请调到研究单位，以读、写为业。不论如何，总算有一点独立性，从此告别整天重复别人的话之苦。（至于笔译我自己选择的、自己欣赏的古典名著，或有意思的美文，那是一种“再创作”和自娱，又当别论。）我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只有短短的五六年中有过为领导人翻译的经历，难道其他都不足道？特别是后半生虽然碌碌无大成就，但也多少有所思考，形诸文字，任人评说。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有无价值，以此为准，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

抬高自己。所以，对此类介绍产生逆反心理。为什么外界偏偏注意这一点呢？也许是出于误解，以为说明一种地位，算是恭维；或是迎俗，大人物总是“吸引眼球”的。我本可以不去理会，但是近来遇到此类介绍越来越多，这一身份越来越突出，使我感到非表明态度不可，以免人们以为是我自己喜欢以此炫耀。我不能否认，也无需讳言我曾有此工作经历。幸好，本人在“文革”开始后入了另册，与红墙之内绝缘，于是在我的翻译经历中没有“四人帮”成员以及当时任何一位新贵，这是值得庆幸的。在那个特殊年代，为“首长翻译”确实只限于极少数特殊人物了。但是假设（只是假设）我当时竟然也被召去执

行为某人翻译的任务，当然是无法拒绝的，那么今天“曾为……翻译”该如何介绍呢？

所以，我今天对“独立”二字弥觉珍贵，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也希望世人以此知我、罪我。

（近有各种版本关于我的简历介绍，常有错误和不确处。以下附上我认可的简历，事实以此为准，详略可自行摘取。）

资中筠简历

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1930 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

1947 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 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 年毕业。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因工作关系，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有机会访问亚、非、欧、拉美多国，并在维也纳常驻三年。“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尼克松访华前，从干校调回，参与接待工作，以后留在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70 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后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

所长、研究员、所长。专业为国际政治与美国研究，旁涉中西历史文化，近年来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改革开放后多次访美，从事学术交流。曾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及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任研究员各一学年。

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 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主要著作：《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

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

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等。

（以上在思想上较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纪的美国》、《财富的归宿》以及收入《斗室》和《读书人》的一些文章。）

译著：（法）巴尔扎克《公务员》、《浪

荡王孙》、《农民》，（美）薇拉·凯瑟《啊，拓荒者》，（英）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等。

士人风骨 第二部分

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本文试图将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的精神演变，从一个角度理出一条脉络，探求出路。文章重点在思想文化，不可能涵盖一切，当然也不可能孤立于大的历史发展背景。

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

人引以为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但文化学术也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中国农耕文明达到的高度和精致程度为世界之最，适应这一文明的专制皇朝制度也设计周到、高度成熟，所以凭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民族都在文化和制度上被汉化。又由于地理的特点，可以长期封闭，“六合之外，姑存不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是唯一未中断的文明古国，原因在此。所以，笔者常说中华民族早熟、早

慧。

一般欧洲史家把 15 世纪中叶算做欧洲近代史的开端，因为那时开始出现与中古告别的文艺复兴、宗教改良以及各种新思潮，为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提供资源。中国的近代史始于 19 世纪中叶，从那时起，极端封闭的社会被打开了一个口子，从此“以夏化夷”的途径逆转，西学开始东渐。所以，中国的“近代”比西欧晚了四百年。以发展道路论，至少从明朝开始，中国与西欧就拉开了差距。这种分法不是主观随意，或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根据文明发展的客观标准。

一 源于古代的传统

(1)

中国古代产生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西方的哲学重理性、逻辑，通向自然科学，造成以后的科学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的哲学通向道德伦理和政治，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传统的读书人都致力于政治文化。正因为如此，中国人际关系之道和政治文化十分发达，而自然科学、市场经济和工业化难以发展。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是独立自由的。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君主采纳他的意见，一国不行，就到他国，困厄、饥饿均在所不辞，到处碰壁，“吾道不行”则宁可“乘桴浮于海”，也绝不妥协。他要求见用的，

首先是自己的主张而不一定是本人，所以绝不放弃自己的学说来迎合在位者。“乡愿”被夫子斥为“德之贼也”。孟子的言论就更加鲜明，与“王”谈话是教训的口吻，一副“帝王师”的架势，是后来的“士”所艳羡、向往而再也做不到的。孟子表达了当时儒家治国的最高理想，现在经常引用的“君轻民贵”之类的话，虽然不能附会为现代民主原则和民本思想，但在等级制度正在发展、巩固的时代，提醒在位者重视“民”，已属难能可贵。他以特有的坦率而透彻的风格，提出的理想社会和对君主提出的要求，是专制君主不愿意也做不到的。难怪到了朱元璋那里，他感到难以忍受，就大力删《孟子》，几乎把今天

看来闪光之处全部删掉，甚至一度下令取消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

一般都把“春秋”与“战国”相提并论，实际上到战国后期，司马迁所推崇的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已经大减，变得功利和实用，以《战国策》为代表，一批舌辩之士用舌头混饭吃。他们只能是“谋士”而不是“帝王师”。所以总是准备几套方案“上、中、下三策”，供君主选择，其目标是助王称霸，而不再是促王行仁义。他们讲究的是“术”，而不是“道”。从道德层面看，也不再坚持原则和人格独立。自此以后，中国的读书人日益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经典著作也仅仅被当作治国的工具。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如果秦皇朝得以巩固，也许可能正式以“法家”治国，但是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树立自己的道统。到汉武帝从董仲舒独尊儒家之后，在道统上儒家学说统治了两千年。董仲舒的原意可能是想用儒学对皇帝有所约束，但是儒家所主张的以德治国、行仁义、“内圣外王”那一套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并杂以黄老之术。如毛泽东从柳宗元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只是柳着重的是肯定郡县反对封建（分封宗室）制，而毛着重的是肯定专政否定仁政。不过对读书人来说，还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治国的理想，都是从孔孟书中汲取资

源。而他们唯一的出路是从政，特别是隋唐行科举之后，更是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

这样的历史轨迹造成的“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一、“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其依据的现实条件是“学而优则仕”。能有资格“忧国”的，大小都做过官。即使暂时不“居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还是有官职，而不是“庶人”。“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是有一定的“位”，不是草根百姓。尽管皇朝是一家的天下，在朝的大臣还是视同己有，因为舍此无以安身立命。

一 源于古代的传统

(2)

二、重名节，讲骨气。“士林”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从而铸就了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他们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顾炎武在明朝败亡之际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意把“天下”和“国家”分开，他明确说“国家（指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那是因为朝代更迭他无能为力，只能努力维护作为精神支柱的道德体系。当然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

在政治思想上尽管定于儒家一尊，但

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从没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士”一旦入朝，成为“大夫”，潜意识的还是继承了为帝王师的想法，以“致君尧舜”为己任，还是努力企图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他们心目中有“明君”和“昏君”的评判标准，历代官史也尊崇“直臣”，蔑视“佞臣”，不少当红的宠臣位高权重，却为同僚士林所不齿。文天祥在殉难前想到的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不是宋太祖或其他什么皇帝的训诫。鲠直之士“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因为自以为真理在握，有这份自信。所以，尽管有杀头、

灭族的危险，面折廷争、冒死直谏之士代代不绝。另外，君臣都重视身后名，对“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很在乎。这一点也是坚持原则的动力之一。

在学术层面，由于有一定的独立性，较少受皇权的干扰，即使在“注六经”中也还能形成不同的学派，特别在唐中叶以后，书院兴起，至北宋蔚为大观。无论在朝在野，学者和书院对道统的传承和丰富起了很大作用，甚至还能发展出疑孔、非孔之学。另外还有一条隐逸之路，在“邦无道”或自己想远离“帝力”时，还可以归隐田园，保持一定的精神独立，并创作出无比丰富的、灿烂瑰丽的文学艺术珍宝。

“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千古名言，深入

人心，不论是否能做到，却无形中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向往。

三、与以上二者并行的还有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见用则“皇恩浩荡”，“感知遇之恩”，万死不辞；获罪则不论如何冤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语出自韩愈《幽拘操》。韩愈是最正统的儒家道统维护者，也应算是直言敢谏之士，明知皇帝好佛，偏要上《论佛骨表》，遭贬黜在所不辞，“肯将衰朽惜残年”！他以同样的忠诚作《幽拘操》，想象当年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时的心情，写出了这句也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周文王代表了儒

家所向往的最理想的天子，他坐牢时也有《歌》传下来，注家有不同解释，此处不论。可韩愈觉得他应该抱这样的态度。这种发自内心的绝对服从，其伦理的依据就是儒家的“三纲”，现实的基础则是人身依附。因为在那种制度下，读书人除了“报效朝廷”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用其学。冒死直谏，犯颜上书，都是出于忠心，就事论事，绝不是反对皇帝本人。无论哪朝哪代多么开明的皇帝都不会容忍对本人公开的否定，连“腹诽”也是罪。为人臣者基本上自觉遵守这一条，因而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久远。

二 西学东渐以后的

变化

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是，以鸦片战争为契机，古老的农耕文明遭遇了上升的工业文明，无法再照老路对入侵者在文化上加以融化。这“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中国人的现代“启蒙”于此开始，到清末民初渐成气候，新潮不可阻挡。

这一探索持续百年。由于面临的问题与以前完全不同，“亡国”不再是朝代更迭，而是与“灭种”联系起来，那时所谓“灭种”，不是真的如希特勒对犹太人那种“种族灭绝”，而是指整个华夏文明的存续问题。所以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

探索也空前活跃。在精神上，传统因素还是起一定的作用。上述忧国忧民的担当与骨气和勇气，在新的条件下赋予了新的内容，驱使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在谭嗣同、秋瑾等烈士乃至早年共产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精神。不过他们不是为维护原来的“道统”，而是力图打破它，朝廷和国家已不是一回事，而是为救国必须推翻朝廷，至少要彻底改造之。这种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与从西方引进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及“社会良知”可以相通，并相互加强。

他们告别的是上述第三点——颂圣文化。这是“新文化”的精髓。从严复的“开启民智”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

“五四”一代人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呐喊，都是企图唤起民众摆脱在颂圣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是传统的，而所承载的观念和思想是新的，从外面引进的。这是一场持续的启蒙。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经历了百年的新文化运动（广义的），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文化教育没有停顿，还在继续发展，新旧结合的“士”的精神没有出现断层。甚而可以说，中国读书人的传统

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现在常为人们所称道的西南联大那些人和事可以为代表，当然不止西南联大，还有“中研院”以及其他高等院校和学人都有可歌可泣的表现。那时政府也是专制，也有高压，甚至还有暗杀，但是总体上，知识精英还是保持了气节和一种价值共识。张奚若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言被蒋介石打断，就拂袖而去，下次开会可以退回差旅费，拒绝参加；马寅初公开揭露孔祥熙，把他骂下台；直到1947年已是内战方酣之时，傅斯年公开发表文章《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半个月后宋子文就被撤职。1940年冯友

兰受西南联大教授委员会的委托给当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写的那封信，最集中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精神的结合。那件事起因是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先生起草回绝函。信是典雅的古文，套用诸葛亮《后出师表》的语气，内容是据理批驳教育部的指令文件，通篇贯穿现代教育独立于权势的理念，掷地有声。信中特别指出，如果按此规定办理，大学将等同于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大学教授在学生心目中将不如科员，受到轻视。结果教育部的指令就此被顶回，学校保持了独立。这里讲的是一种精神。至于个人在多事之秋各自信奉不同的学说，在国家分

裂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是另一回事。

讲“新文化”还应包括另一个群体，就是抱着实业救国理想的一批实业家和他们成就的事业。从张謇到卢作孚到陈光甫，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来。后来他们被归入“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不同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一般企业家，因为他们身上也承载了中国传统加外来先进文化，办实业和金融带有浓厚的“救国”目的。近年来从国外引进并自 21 世纪开始时兴的“企业社会责任”（CSR）之说，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企业界是普遍默认的一种价值观。“为富不仁”、“见利忘义”、“背信弃义”都是为业界所不齿，一旦犯此恶行，难以在本行业立足。特别是在日

寇压境时，不少人毁家纾难，不当汉奸是区别良莠的底线。现在“儒商”成为一种时尚，成为某些新富所追求的装饰。而在那个时期，不少企业家、金融家本身就是读书人，他们的传承与修养以及本身的优点与弱点同“士林”是相通的，而且以他们的经济实力支持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这里不谈他们对民族经济所作的贡献，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应该也是“启蒙”的一部分。

这一百年“启蒙”并非持续不断，而是常为内忧外患所打乱。当时的环境是列强环伺，内政混乱，启蒙和反帝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启蒙需要向西方学习，反帝的对象则是西方列强，从这里引发出难以化

解的矛盾。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似还不够准确。最初启蒙就是为了救亡，毋宁说是日本侵略打断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最后是革命压倒了启蒙。

三 1949 年以后的 “政教合一”与颂圣文化...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 1976 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

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一）客观形势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

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

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

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

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

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三 1949 年以后的 “政教合一”与颂圣文化...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

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

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

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 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 1962 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

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 1958 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

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三 1949 年以后的 “政教合一”与颂圣文化...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

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1. “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

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

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 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

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 知识成为原罪。1949 年以前受过

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 “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

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

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作“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 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 95%，直到“文革” 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

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四 改革开放以后的 曲折道路（1）

以 1979 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

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 1949 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

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

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

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

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四 改革开放以后的 曲折道路（2）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

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

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吏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

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 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 1840 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

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

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

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

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2010年）

士人风骨 第三部分

一代风骨今何在？（1）

——读《民国那些人》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人们惯于以“动荡不安”来形容：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党争、内战、列强瓜分、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民生凋敝……近一二十年以来，历史文化的研究有了新的视角，对民国史的研究逐渐采取比较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史学界有识之士的努力，那个时代的真面目连同其积极的建树逐渐现出轮廓。其中最重要的、对后人深有启发的，是在各个领域内的“文化人”或“知识人”所代表的精神。那个时代、那些人，其实离我们不远，有一些还与我们共同经历了 20 世纪下半叶的风雨。但是其风骨、学养、识见似乎又离我们的时代很远，我们看到的是

逝去的背影，面貌已经模糊。近年来，经过一些有心人的钩沉探秘，以及某些同辈或后辈的回忆录，一些被否定的人物得到公允的评价，被遗忘的名字逐渐浮出水面，被屏蔽或歪曲的史实得以返真。现在，关于那一代文化名人的个案或集体的研究方兴未艾，应该说是在一片功利和浮躁的风气中，学术文化出版界的一个亮点。

我手头这本《民国那些人》又另有特色。那是《中国青年报》“冰点”版 2004—2006 年一个栏目的专稿，每周一篇，每篇写一人，约 1600 字，集结成书凡 80 人。他们率多出生于晚清民初，卒于 20 世纪后半，最早出生在 1840 年（马相伯），最晚逝去在 2006 年（林庚），遍布教育、

学术、文化、实业、新闻、政治各个领域。其中有些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名字，我个人有幸亲睹风采，曾沐春风的师长有梅贻琦、冯友兰、叶企荪、梁思成、罗念生、李赋宁、潘光旦、雷海宗、马约翰、金岳霖等人，其中雷先生、罗先生的课是正式上过的，李赋宁的课则是旁听，而且还有一次特殊的关联——李先生 1950 年刚从国外回来，在工字厅举行婚礼，我有幸应邀为他们（钢琴）奏婚礼进行曲，那恐怕是那个年代校园中最后的这种形式的婚礼了。潘先生作为清华图书馆长，我听过他精彩的报告，至今还有印象，而且潘师母与我母亲是同学，曾邀我到他们家过节。至于马约翰，只要赶上他执教时段的清华学生

都上过他的体育课，也都忘不了他对体育的独特见解和别具特色、中英夹杂的训话。以上提到的其余诸先生在不同的场合都有过一些接触。所以读这本书有特别的亲切感。但是书中还有一些连我都不曾听说的人物，遑论当代青年！其名已湮没而其事却值得大书特书。例如我自以为对历届清华校长都略知一二，但读了这本书才知道还有一位周诒春校长曾对清华有开创之功，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他任内确立的，著名的早期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是他亲自规划的。我此前竟然毫无所知，感到汗颜。实际上我当年执意要上清华，那图书馆和大礼堂的吸引力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书中

这类被遗忘的人绝不止这一例，只此一端，就可见本书作者“钩沉”之力。

“那些人”背景各异，或生于世家，或起于贫寒，经历极其丰富曲折，思想倾向不同，性格作风也各有鲜明的特色。如刘文典之狂傲，赵元任之洒脱，傅斯年、马寅初之刚正，梅贻琦之涵养和包容，曾昭抡之不修边幅，叶公超之风度翩翩，蒙文通治经史、理学，赵紫宸精通基督教神学……千姿百态，在短短的一千多字中也只能撷其片段轶事。但是放在一起，通读之下，惊异于贯穿其中的精神的一致性。古有“建安风骨”，讲的是“文”，而“那些人”的“风骨”不论冠以什么名称，讲的是“人”，是一种“魂”。

一代风骨今何在？

(2)

这一以贯之的“魂”是什么？本书的“序言”题目一语中的：“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中国“士”的精神内涵又是什么？可能理解不一。我自幼承庭训，读一点论、孟，印象最深的几句话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等等。这些话，总的精神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坚持真理，坚持独立的人格”。而另一方面，不满足于消极的洁身自好，而是对国家、

民族有高度的责任感。有时退而“独善其身”是不得已的，内心的抱负都在“兼济天下”。这种精神包含了中国读书人最看重的“骨气”和“担待”两个方面。保持人格独立，如果没有外界压力，十分容易做到，也就无所谓坚持了。而在中国几千年的特定条件下，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甚至以命相争才能守住的。压力不言而喻，首先来自权势，所以“坚持”的另一面就是不畏权势，从孟夫子的“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我得志弗为也”，到魏晋名士的特立独行，都有藐视王侯、不畏权势的特点。来自另一面的压力是“俗”，要“坚持”就必须不随俗、不媚俗，不与“潜规则”同流合污。在上下左右的夹缝

或夹击中坚守自己的“志”，保持人格完整，心灵自由，方显其风骨之可贵。

这种“风骨”是千百年锤炼出来的中国的“士”的精髓，但是在“那些人”身上又有其时代特色，那就是中国人已经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放眼世界之后。自马相伯出生的 1840 年起，中国就身不由己地置身于世界潮流的沉浮、博弈之中，再也无法闭关自大。从那时起，西学东渐，有志之士就以变革图强为己任，到“民国那些人”活跃于历史舞台时，已经得到一代或两代先驱之传承。他们的言行、事业都已注入现代化的因素，或径直以中国现代化为目标。他们是新文化继往开来的一代人，有传承，有创造。其中绝

大多数都“留过洋”，不但在本专业学贯中西，而且立身处世也融中国“士”的坚守和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于一身，不过在各自身上中西成分的比例有所不同罢了。他们还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考验。在民族存亡之秋，于艰苦卓绝之中，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现代知识人的献身精神高度融合，无意中写就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近来关于继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常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其实本书所写的“那些人”就是中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优秀典范。他们已经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初步探索出以中国的精华融入世界文明的道路。他

们的存在反过来证明“新文化运动”（并不一定从“五四”开始，但以“五四”为标志）绝没有使中国文化断裂，相反，使其获得新生。如果有“断裂”，那是以后的事。

“那些人”的命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其中多数人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朝换代，曾被要求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对自己前半生的功过是非重新评价，甚至颠倒过来。还有一个令人感慨的现象：其中“幸而”早逝者得全身而退，少遭劫难；多寿则辱；而再长寿一些，则又得以再现余晖。本书对每一个人都摘出能表现其学术或事业亮点和人格魅力的片段，同时也对整个一生的浮沉有所关照。

作者本人的爱憎和感慨随时流露于字里行间，尽管着墨不多，而且相当含蓄。此类例子不胜枚举，限于篇幅只举一例以见一斑。

一代风骨今何在？

(3)

我认为写得最精彩的篇什之一，是关于冯友兰先生的那一篇。冯先生学问博大精深，以及对教育的贡献，自不待言。而作为“两朝”学界耆宿，后半生在自我否定前半生中委曲求全，至今遭到不少求全之毁。幸亏先生高寿，赶上在最后十几年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得遂宿志，并为后世留下珍贵的遗产。后人学中国哲学史绕不过冯先生，而欲知冯先生，亦有皇

皇巨著为凭。本书写冯先生的精彩处在于，于浩如烟海的著述中单单选出两篇非学术性的文章：一是代表西南联大教务会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抗辩函，反对教育部核定课程、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的新规定；另一篇是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这两篇文章无论是在教育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再高评价也不为过。更重要的是，这两篇文章都集中体现了上面所说的代表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士”之精神。一篇是对最高权威的抗争（谁都知道，陈立夫绝非一般的教育部部长而已），以“同仁不敏，有所未喻”开始，然后是“未喻者一也……二也……”软中带硬，自是诸葛亮“后出师表”之遗风。另一篇是骈体文。

它写了西南联大的精神，特别提到“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写了冯先生始终一贯的对国家的希望：“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更写出了抗战胜利的喜悦、深沉的历史感和家国之思，有几句特别精彩的话，书中没有引：“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用典之当，对仗之工，情景之合，含义之深，令人击节三叹。以古文写今事到这个水平，前或有人，后无来者是肯定的。这是冯先生自己最得意之作，也浓缩了那一代学人的学养、在强权面前的坚守，以及对这片土地的刻骨铭心的爱。但是后来呢？本书作者的眼光不但表现在选这两篇文章，而且表

现在标题、开篇和结尾。标题是：“两束雄文，一抹背影”——以“雄文”始，以“背影”终。开篇第一句话，画龙点睛：“曾有那么一个时代，大学教授们矜持而有尊严。”中间写三十年后，冯先生自己重读这两篇文章的自我评价：“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犹过于当日操笔时也。”作者说“冯氏的感慨岂止是敝帚自珍，分明是沉重的历史慨叹”，因为“当见识和感情受到羁绊，难以发为雄文，于是便只留下了一抹颓唐的背影”。一语道破，起冯先生于地下，当引为隔代知己。结尾是金岳霖和冯友兰两位大教授竟为检讨难以过关而抱头痛哭。读罢能不令人掩卷深思！

我举出有关冯友兰一篇加以剖析，是因为我对冯先生比较熟悉，对所举的两束雄文特别钦仰、激赏，而本篇又极为精当地概括了一种精神由盛到衰的各种元素。事实上，这样的文章书中绝不止这一篇。例如在“东京审判”中壮怀激烈为中华民族讨得正义和公道而名垂青史的大法官梅汝璈，晚年孤寂，“文革”检讨中说自己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词典”。“巍巍乎南开大校长”张伯苓，曾为创办南开付出一生心血，愈挫愈奋，自称“不倒翁”，易代时选择了留在大陆，却欲返校小住而不获准，校庆日不得进礼堂，自叹见弃于新社会，伤心以终。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以最大的魄力倾自己的船运公司之

力，完成号称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卢作孚，竟以自杀终。其余如叶企荪、陶孟和、潘光旦，等等，等等，都有过闪亮的功业，而晚境凄凉，下场悲惨。身后再获公道，以其精神嘉惠后世，但是斯人已逝，时光不能倒流，说“告慰于九泉之下”，还是为了活人取得安心，“九泉之下”是不会有知的。

最后，不能不提及本书作者徐百柯。我与这位年轻人素昧平生，读到这本书，看到作者介绍，才惊异地发现作者竟是“七〇后”！他写此专栏时年龄不满三十，出校门不久，可以算是“初出茅庐”，而书中所表现的识见、用心、沧桑感和文字修养却大异于当代同龄人。一般写长篇易，

写短篇难。难得的是作者在选人、选材和谋篇布局中所表现的心有灵犀，在两年的时间里把握住前文所说的一以贯之的精神。当然此栏目已经得奖，无需我锦上添花。我只是作为一名读者，在回味无穷之余对作者生出赞赏；而作为一名老人，又对后生可畏感到欣喜。费孝通已经感到自己与乃师潘光旦有了差距（不仅是指学问），我自己也深感与书中所写的前辈师长之间不可追补的差距。但至少还曾经沧海，虽不能至，尚知何处望之。再下来呢？存亡继绝依靠谁？所以我在一片浮华喧嚣中每当见到好学深思、有所守望的年轻人，总是感到欣慰，升起一缕希望。

欣慰之余，又有另一种感想：这些文

章还有一个特点是作者颇能拿捏分寸，一些话相当含蓄，点到为止，尽在不言中。这可能是在今日媒体的处境中练出来的功夫。一方面说明作者的聪明和文字能力；另一方面我略感遗憾，在这个年龄本该锋芒更露的。书中所写“那些人”在这个年龄时大多有过书生意气、放言无忌的表现，而当代青年可能一出手就遇到“见识和感情受到羁绊，难以发为雄文”。联想到“冰点”曾有的遭遇，能连续发表这一系列文章实属不易。我期盼着一个见识和感情不再受到羁绊的环境早日出现，庶几当代有才、有识、有志的青年在锋芒未磨圆之前得以俯仰自如，尽情发挥。

（2008年春节过后，于芳古园陋室）

方孝孺和布鲁诺(1)

闲来胡思乱想，常引发一些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联想，由方孝孺想到布鲁诺即其一。他们两个相隔千万里，时差二百年，在脑子里把他们联起来的纽带：一是他们各自所受的惨绝人寰的极刑（方孝孺被“磔于市”，也就是当众凌迟处死，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二是他们两人的事迹在我中学时代就留下深刻印象，心目中都是威武不屈的殉道者，死得英勇、惨烈。但是，现在细想他们各自所殉的“道”是什么，引起我对中国和西方文明巨大差异的深思。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

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炆的老师，称“汉中教授”。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建文帝（明惠帝），方孝孺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尽管他年龄并不老（死时才四十五岁）。建文四年（1402），朱元璋的另一个儿子，即建文帝的叔叔燕王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为明成祖，就是使明朝从此定都北京的有名的永乐帝，惠帝则“不知所终”。当时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有死保旧皇帝的，后者当然都被杀或自杀，有名有姓的大臣在《明史》上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灭族”的不计其数。到那时为止，最重的刑律是灭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灭十族”，

那第“十”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关于“十族”的来由，流传较广的故事是：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坚拒，投笔于地，又哭又骂，再强迫他写，他就写“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对他说：“汝独不顾九族乎？”方说：“便十族奈我何？”于是他的门生多人也被“收斩”。不过一般正史不采此说，而是说方表示宁愿立刻死，不草诏书，朱棣说：哪得遽死（意思是太便宜你了），当灭十族。那么“灭十族”是皇帝的发明，而不是方孝孺一句话让他学生遭殃的。不论采何说，总之株连“扩大化”及于学生是从那时开始的。当然，后世的学生如及时划清界限，揭发批判老师，则可幸免。

据史书载，仅方一案，受株连而死的有八十七人。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方孝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由衷敬佩。这也是传统气节教育的一部分。

方孝孺死难时是 1402 年，是 15 世纪的开始。斯时也，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驱赶着中世纪的黑暗，欧洲正在迈进蓬勃发展的近代史。思想、人文、科学、艺术大放光彩，人才辈出，以科学和民主推动人类文明，独领风骚五百年。15 世纪的开头，1401 年，德国人尼古拉斯·德·库萨（Nicholas de Cusa）诞生，他的职业是主教，同时也是科学家和哲学家，是挑战传统、破除地球中心论的托勒

密体系的先驱。一百多年后，波兰哥白尼“日心说”问世（1543）。哥白尼死后，紧接着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1548）。布鲁诺的一生既坎坷又丰富，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善于独立思考，是典型的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人”，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才华横溢，著述甚丰。他的宇宙观与库萨和哥白尼一脉相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提出了宇宙无限论。他的哲学思想对 17 世纪的斯宾诺莎有重要影响，因此被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先驱。在当时，他所坚持的宇宙观，既不容于旧的天主教，也不容于坚持亚里士多德教条的新教。他周游北部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凡十年，到处讲学，到处与人

辩论，同时找机会出版他的著作，最后在哪里都难容身，终至回到意大利惨遭刑戮。

方孝孺和布鲁诺(2)

布鲁诺早年在那不勒斯求学，当过多米尼克教会的修士，研究神学，不久就涉嫌思想异端，为逃避当地教会的审判，逃离那不勒斯。先到罗马，又被诬陷杀人，面临逐出教门的审判，于是逃亡瑞士。在那里，他放弃多米尼克教，皈依新教加尔文派，但是令他失望的是，加尔文派也排斥异端，他又因思想罪而遭逮捕、逐出教门，获释后到法国。当时的欧洲虽然保守是主流，但并非铁板一块，学术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留有一定的空间。法王亨利三世的朝廷是开明天主教派占上风，布鲁诺

得到庇护，被任命为王家讲师，得以暂时在巴黎栖身，并发表他的著作。其间，他作为法国驻英大使的客人到过英国，也曾为伊丽莎白女王宫廷的座上客，但是他的学说不见容于权威的牛津学派，于是又回到巴黎。但是此时的巴黎政治气氛已非昔比，亨利三世废除了容忍新教的法令，而布鲁诺却不稍敛锋芒，更加公开地与权贵论战，并公开批判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布鲁诺至此在巴黎无法容身，跑到德国，在那里游荡于各大学之间，继续讲学、发表著作，不但宣传他的宇宙观，而且主张各教派和平共处、自由争论，其辩论的对象既有教会又有学术界权威。结果又被新教路德教会开除出教，德国也呆不下去了。

此时刚好有一名威尼斯贵族“诚聘”他回到意大利任他的私人导师。威尼斯在当时比较开明，而且布鲁诺得知那里的帕多瓦大学数学系主任一职正好空缺，他遂于1591年末装回威尼斯，直奔帕多瓦大学。不过他没有得到那个教职（一年后任命了伽利略），就住在那位贵族家中，任他的私人教师。与方孝孺株连学生相反，布鲁诺是被他的学生出卖的。不久，这位学生就对老师产生种种不满，向宗教法庭告发他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遂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他为自己辩护的说辞一直是坚持自己的理论只涉及哲学，与神学、教义无关（和伽利略一样，他主张对《圣经》只遵循其道德说教部分，而不包括其

宇宙观)。在威尼斯他也许还有希望得到开脱，但是不幸他受到严厉得多的罗马教廷的注意，把他引渡到了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七年，种种辩护都无效，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最后终于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给夹住，足见他的言论有多大的威慑力。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见株连到其他人（欧洲好像没有“族灭”之刑律）。

从方孝孺到布鲁诺殉难的二百年中，欧洲完成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发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结束了

神权统治，民族国家成型，为 17 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 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在天体物理领域，哥白尼开始的宇宙观的革命经伽利略到开普勒基本完成，最后到 17 世纪中叶由牛顿集大成，他关于万有引力的发现解决了“日心说”的最后一个疑点，并开启了现代物理的新时代。布鲁诺是这场持续的科学革命过程中的一位烈士，实际上此时的宗教裁判已是强弩之末。以后，科学受到教会以及社会保守势力的非难和压制还时有发生，但不论是教会还是君主，再也不拥有对思想信仰的生杀之权了。布鲁诺个人的结局虽然惨烈，但是，实际上他生前还是有相当的活动空间，已经有机会到处传播

他的学说，并发表著作。那时的欧洲并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局面。

方孝孺和布鲁诺(3)

反观这二百多年的中国，无论生产方式、上层建筑，还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明朝在内部杀戮、争斗中，在宦官、权臣、昏君专政中，在边患频仍、统治面积日益缩小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谏之士人头落地中走向衰亡。1600 年是万历二十八年，当时的形势是皇室、官府层层横征暴敛，内部民变蜂起，外部边疆告急。这一年的大事：一是发动几路大军镇压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一是宫廷之内宠妃专权，威胁太子的地位，又有一位“忠贞之士”关心帝王家事，为维护太子而上书直谏，

触怒皇帝，遭到“下狱”、“廷杖”、“除名”。

此人名叫王德完，官职给事中，如果没有这件事大约是根本名不见经传的。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清军入关，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新一轮生灵涂炭加道德危机。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尽管是另外一个民族，还是延续着大同小异的君主专制政体，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历史，凭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道统。“明主”继以“昏君”，皇朝由盛而衰，士大夫的追求和价值观依然如故，大臣或“忠”或“奸”，端看从哪个皇帝或潜在的皇位继承人的角度出发。只不过这是最后一个皇朝，以后的历史轨迹却被欧洲人打乱了，从此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

说来也巧，清顺治元年（1644），欧洲适逢英国克伦威尔议会革命成功，五年后，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这件事与建文帝的“不知所终”和崇祯之死意义大不相同，因为它导致了君主制度的结束。尽管以后还有反复和曲折，对克伦威尔其人其事史家也有争议，但他发动的这场革命为二十年后“光荣革命”的先声，最后导致英国宪政民主的确立，对18世纪的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变革都有深远影响。而且，欧洲文明加炮舰从此一路扩张开去，直到轰开中国的大门。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

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除非再有更高明的科学家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推翻这一结论。这就是科学。与此有关的人，在压力面前可能表现不一：哥白尼摄于可以预料的压力，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利略有坚持，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布鲁诺则刚直不屈，卒至以身殉。但是不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并且载诸书册。他们

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人是人类进步的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另一个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就是朱家天下。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么？

方孝孺和布鲁诺(4)

我的思古之幽情再退后到公元前二

三百年间。那时的希腊几何学之父阿基米德正在埋头研究、发明一条一条的几何定律。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是，国王叫他辨别工匠制作的金王冠的真假，他在洗澡时偶然发现浮力原理而欣喜若狂，一声“尤里卡！”贯穿时空，成为不朽的天籁。不论这一传说是否真有其事，阿基米德对数学和力学的贡献以及他个人对此的着迷是事实。方其时也，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做什么关心什么呢？那正是战国后期，当时热门的新学是“纵横学”，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他们与同时代的策士们正奔走于七国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居王位者兜售他们的谋略，留下的不朽著作是《战国策》。在那雄辩的辞章中，充满着纵

横捭阖、权谋计术，极尽坑蒙拐骗、挑拨离间、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之能事。其心计之深、思路之复杂，令现代人望尘莫及。如今，“博弈论”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颇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津津乐道，其实战国策士们那种像下棋般一步一步揣摩对方的反应，决定对策的“弯弯绕”，现代的博弈专家跟着转起来恐怕也很吃力。这种思维的路数，其实与几何学推理是一致的，只是用处不同，结果也就不同。战国时天下未定，思想还没有定于一尊，苏、张之流不必像汉以后的士大夫那样对一位君主从一而终，也就无气节可言。不过华夏文明到那时已相当成熟，纵横家的计谋与儒家的忠孝节义，同样是留给后世

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以及从何时开始落后的。许多人不甘心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这一事实，总是举出四大发明，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还有祖冲之推算出圆周率早于西方人一千年，等等。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志”是什么。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

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超越于“经世致用”的客观存在——的“傻劲”。中国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处理人际关系。不过惟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传统之累。当近代西方人争取到了思想言论自由，建立了保护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再不必因“异端”而获罪，从而进一步释放出无限创造力时，中国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尽入彀中，一方面发明文字狱收紧文网，禁锢思想。其结果的差异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涉及政治斗争，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有许多钩心斗角的“谋略”，也出现形形色色的“谋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

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的“士”的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而政治又等同于朝廷。“学得文武术，售与帝王家”，如果帝王不买，“经世致用”就完全落空。

还常见有文章强调，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造船业比欧洲先进，说明中国本来可以从那时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甚至有人假设，如果郑和再走远一点，到达了美洲，今天在那里的就是黄种人了，整个历史就要改写。姑不论这种假设如何想入非非，有一个基本问题是，郑和出海的目的的是什么？派他出海的正是那位夺了侄子皇位的永乐皇帝，他即位不久急急忙忙派人出海，而且满朝文臣武将都不用，单

派贴身太监，绝不是有向海外扩张的雄心，其初始目的是搜寻那位“不知所终”的建文帝。因为关于建文的下落传说很多，流落海外是其中之一。只要旧皇帝还有出现的可能，永乐的皇位就存在潜在的威胁，这才是他为之寝食不安、戚戚于怀的头等大事，所以才要“七下”西洋。其次当然还有向“化外”的岛民宣扬我中华神威之意。所以，不论船只如何先进，郑和本人的才能如何了不起，这与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水到渠成出于商业需要，推动航海业的动力是截然不同的。再说，本人未考证过郑和的船比同时代欧洲最先进的船究竟如何。但是，倾全国的国力和能工巧匠为皇家造一条或几条船，与能代表

社会生产力的造船“业”的发达是有区别的。

布鲁诺和方孝孺的差别，是他们所植根之土壤的差别。谁也不能否认我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我华夏民族智慧高度发达，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归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轨迹。这一历史轨迹到了晚清终于给打乱了，中国近代史于焉开始。

（2001 年）

关键在于立宪（1）

——从袁世凯的洋顾问主张君主制的公案引发的思考我国有关 1915 年袁世凯称帝的正史与野史中，多提到袁的美国

顾问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德诺主张中国实行君主制一事，并多把此事说成对袁及“筹安会”起了重大影响，有的甚至说严复等人是受了古氏的影响。其根据就是这位教授应袁世凯之请提交了一份比较各国政治制度的《备忘录》，译成中文后以《共和与君主论》为题发表在1915年8月3日的《亚细亚报》上，被“筹安会”作为拥袁称帝的有力依据，在其8月16日的正式宣言中指名道姓地提到，说是“世界共和之先达”美国的“大政治家古德诺博士”也认为“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这样，美国顾问主张中国复辟君主制几成定论，推论下去，似乎这也代表了当时美国政府的态度。笔者偶然从美国档案中见

到此事的原委和古《备忘录》的原文，感到需要将有关各方的态度作一番实事求是的分析。

一 问题提出的背景与经过这件事在《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1915年卷中有详细叙述。根据当时的美国驻华代办马慕瑞（John Van A. MacMurry）发回国内有关“筹安会”情况的报告称：时任袁世凯顾问的古德诺于7月中旬从美国回到中国，下车伊始，袁世凯即要求他提交一份比较各国政治制度，并与中国国情相联系的《备忘录》供他本人参考，当时古氏对袁有称帝的意图全然不知，只根据自己的认识写了一份理论探讨的文件，实际上是一篇学术论文。“筹安会”的声明一出，

古氏大呼冤枉，立即致函美国驻华公使馆详细说明情况，并附上他为袁世凯写的《备忘录》全文，同时在报上发表声明，禁止把他的名字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这样的话连在一起，并重复了他在《备忘录》中与中国有关的一段说法，说明他从未主张中国现在恢复帝制。

关于列强对此事的态度，在马慕瑞发回国内的报告中也有所表述：马氏首先对自己过去对“筹安会”的活动估计不足，未给予应有的注意作了检讨，说是现在看来此事声势相当大，已得到多数内阁成员和最有势力的军事领袖的支持，甚至一些一向与共和运动关系密切的留过洋的少壮军官也在不同程度上同情恢复君主制；

另一方面反对者似乎只是学理上的，看不出强有力的抵制行动。中外观察家大体上都认为现政府牢牢掌握着局势，任何反对的运动除非得到日本的支持大约都成不了全国性的气候。广大老百姓只要政府的管制和税收不太苛刻，对于政府体制是漠不关心的。至于外国，总的态度是：如果中国人认为有可能恢复他们传统的政体而不引起革命或破产或外国干涉，那就好。但是对于能否做到这一点，各国估计不一。这就是当时列强对复辟运动的估计和态度。当然，关键人物是袁世凯，事实上，当时列强在袁世凯与孙中山之间的确看好前者，认为他是能够维持稳定局面，从而保护外人在华利益的“强人”。包括美

国在内的西方各国还没有像今天那样热心向中国推行民主制度。袁当总统或当皇帝对他们都不重要，中国人民享受什么权利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但是他们的确高估了袁世凯的地位和势力，低估了反复辟的力量。以后事实的发展众所周知，不必赘述。

关键在于立宪（2）

二 《备忘录》内容提要

那么古德诺的《备忘录》全文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今以美国外交档案中的英文本为依据，作一客观的介绍和分析。

《备忘录》实际是一篇学术论文，相当长，分六大段，概述如下（小标题是原来的，着重号是本文作者所加）：一、“君

主制源起于个人”。文章开宗明义说，一个国家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并非取决于人民自觉的选择，而是实际生活的需要、历史传统、人民习惯等，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力量。所有君主制归根结底都源于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如果此人统治英明，又很好地解决了继承问题，就可能建立一个王朝，否则生前身后都会发生因争王位而引起的混乱，乃至内战。继承人应通过得到公认的一种制度产生，而不是由在位君主指定，否则仍免不了因王位继承问题而宫廷阴谋迭出。在这方面，英国的长子继承制最好。

二、“欧洲诸共和国”。这一段把美国也包括进去，比较了英、美、法建立共和

国成败的历史：英国克伦威尔死后王朝复辟的原因之一，是克伦威尔没有解决好继承问题。美国建立共和制是最成功的，最主要的因素一是乔治·华盛顿本人坚信共和；二是实际上北美大陆继承了英国的宪政和议会制的原则，在独立之前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了；三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人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产生国家领导人的制度，为全体人民所熟悉，杜绝了因争继承权而引起的混乱。法国原来没有任何实行宪政或议会制的传统，一向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人民没有自治的训练，因此法国大革命后几次王朝复辟，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动乱才确立了现在的共和国制。现在的法国和美国的共同点是：都解

决了继承问题，亦即建立了一套全民确认的选举制度；教育普及，人民知识水平高，都有了长期自治和参政的训练与经验。

三、“各拉丁共和国”。这里指的是拉丁美洲国家。中南美洲前西班牙殖民地诸国，独立之后大多仿效美国和法国的共和制，但基本不成功，出现长期动乱。其原因一是在争取独立的曲折斗争中形成的各种政治派别争权不已；一是人民教育水平太低，习惯于君主专制而无自治能力。这些国家曾有过短暂的稳定期，都是在强有力的军人专政下出现的，但是这种稳定正孕育着动乱。到目前为止，共和制稳定时期较长的是智利、阿根廷和巴西，它们的共同点是在建立宪政方面相对来说进

步比较显著，已经经过了相当长期的混乱，在此过程中人民有了一定的参政经验。

四、共和国的经验教训。文中反复强调共和制的成功取决于两点：一是人民的教育程度和在宪政制度下参政的经验；二是继承制度的解决。而在一个人民教育程度很低，又无宪政经验的国家要通过共和制来产生继承人（即选举总统）很难成功，其结果往往是出现最坏的军人独裁政府，最好也不过是在各派力量争权中混乱与相对安定的局面交替出现。

五、列强不允许乱。当前欧洲列强将不允许与它们利益有关的国家长期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因为它总是伴随着动乱。列强可能并不关心别国实行什么制度，但

它们要求这些国家局势稳定以保护它们的投资利益，如果因政局动荡而损害其利益，它们就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干涉，直到破坏有关国家的独立，甚至直接接管该国政府。“在现代条件下，各国都必须制定某种能够维持安定的治理方法，否则就得置于外国控制之下。”

关键在于立宪（3）

六、对中国的需要的思考。以上述理论和条件衡诸中国：人民教育程度既低，又一向习惯君主专制，从无参政经验，顺理成章的结论显然是不适宜实行共和。

“君主制比共和制更适宜于中国，这是不容置疑的。”中国要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维持下去，实施宪政势在必行，这应是

渐变的过程而不是突变。根据中国的历史、社会、经济条件及其与列强的关系，作为一个君主国比作为一个共和国来完成这一渐变要容易得多。可惜清朝末年未能完成已经开始的制宪就被推翻，否则按照一个指定的委员会的设计有步骤、有秩序地实行立宪，情况会好得多。有一个公认的皇族，也较易解决继承问题。辛亥革命四年来，实际上继承问题（即下一个总统如何产生）并未解决。但是中国人民对清朝的异族统治积怨太深，早就想推翻它，不可能让它维持下去，而在当时的形势下，推翻王朝后除了建立共和国之外别无选择。

那么既然已经建立了共和国，是否应

该恢复君主制呢？这才是当时的关键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古氏恰恰回避了正面作答，只说要十分慎重，提出了由共和变君主制的几个必要条件：1. 不会遇到国内人民及外国的反对，以至引起动乱，维持目前安定的局面至关重要；2. 一定要解决好继承问题，使国人对此没有疑问，因为君主制比共和制最重要的优越之处就在于较易确定继承人，但是尽管皇帝比总统在老百姓心目中权威更大，也不能由君主本人单独指定继承人，而是要建立一个得到承认的制度和程序；3. 必须对在君主制下实行宪政的方式做出规定。中国如果要在世界民族之林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必须在人民中间激发起更大的爱国精神，国家

要抵御外侮则必须有更强有力的政府，强有力的政府来源于人民的支持。无论是为激发爱国精神或是为取得人民的支持，都必须让人民更广泛地参政，有较强的参与感，同时使人民感到政府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对政府的行为能有某种程度的控制。

最后，古德诺说，如果以上三个条件具备，则恢复君主制显然有好处，但是这几个条件是否能实现，只有了解中国并对它的前途负责的人才能做出判断。

在 8 月 18 日对报界发表的声明中，古氏基本上扼要重复了《备忘录》中的观点。他特别声明，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情况下君主制都优于共和制，而是认为视国情而异。中国的国情一般说来更适宜君主

制，但是现在要从共和回到君主制，就需要具备上述三个条件。记者追问他是否认为中国具备这些条件，他仍然拒不作答，重复了《备忘录》最后的几句话。

三 关键在于立宪 《备忘录》作为一篇学术论文，从学理上应该说是言之有据，立论相当严谨的，其对英、法、美制度的比较也与方今学术界一般的共识大体上差不多。对拉美各国的看法也是符合实情的。关于中国，有一点往往为论者所忽视的是，全文有一个重要的大前提是“立宪”。在论述共和与君主的优劣时，其出发点始终是如何对实行宪政更有利，绝不是指恢复旧式的君主专制。英国是君主立宪的典型，文中没有多加论述，因为这一前提是

不言而喻的。他反复强调的两点——继承问题和人民的教育程度及参政经验——证之于近百年的中国政治史的确都很重要。如果一般地说君主立宪比直接实行共和更适合某国的民情，也无可非议，因为问题不在名义上是什么国体，而是实质上人民有多少发言权。至今英国和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都还是“王国”，其实质上的民主和法治的程度远远高于许多号称“共和国”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

关键在于立宪（4）

问题在于联系到当时中国的特定情况应该怎样看。对于中国是否回到君主制，古氏坚决不表态，而是提出上述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实质上都与宪政有关。作为一

个西方政治学家，他注重的是建立一个为国民（people）普遍接受而大家（包括君主）都要遵守的制度。归根结底还是必须立宪。他用的“people”一字大约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人民大众，实际是指各种可能对政治起作用的社会力量。重要的是，这些力量不发起足以引起动乱的反对行动。换言之，如果袁世凯真能做到力压群雄，一时无人反对，也还不够，还必须做到身后也不会因争继承权而引起动乱。袁要传子也可以，只要传子的制度通过立法得到确认（按：这最后一点是笔者的发挥，古德诺并未明说，但是对恢复帝制最热心的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显然这些条件在当时是不存在的。

“洪宪”朝廷在全国讨袁声中八十三天而亡，印证了古氏的第一个条件就不具备，其他两个就更不用说了。

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戊戌变法已经失败，而且是以人头为代价，证明在中国要在君主制度下“有秩序地”逐步实行宪政是行不通的。在这点上，古德诺的诊断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他把辛亥革命的原因归于中国人反对异族统治，那可能是由孙中山最初“驱逐鞑虏”的口号得出的印象。事实上辛亥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王朝不可能自觉地完成立宪的任务，与其民族属性无关。清朝入关后在主要的典章制度上早已汉化，清朝盛时汉人也早已臣服。晚清之所以政治动

荡，各种改革和革命蜂起，主要不是满汉之争，这无须赘言。这位美国学者看到了人民教育程度和参政能力对实行共和的重要性，却没有看到在君主这方面顽固的传统和缺乏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对实行宪政的不可逾越的阻力。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根深蒂固，最高统治者从来是超越一切法律制度之上的，而“立宪”的实质恰恰是要把宪法置于君主之上，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要君主自觉地自上而下来实施等于缘木求鱼。诚然，在晚清所处的那种特定的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不用说光绪，即使慈禧本人也被迫接受了某些变革，还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但是这离真正的立宪差得

很远，而且随时可以翻过来；另外，这种变革只有在王朝面临危急存亡的时候才被迫实行，此时君主已没有古德诺所说的在人民中享有威望的优越条件；而如果王朝强盛，还有威望，就不会感到有变革的需要，这是在中国国情下的悖论。这一国情与查理二世的英国，与拿破仑称帝后的法国相去十万八千里。清朝末年的中国也出不了彼得大帝。这里不详细讨论。所以古德诺为清王朝未能完成宪政即被推翻而惋惜，说明他确实不了解中国国情。但是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错。中国在号称建立共和制之后真共和了吗？共和以来哪一部宪法能约束得了最高掌权者？对最高统治者的位置的继承或接班之争，长时

期没有正常的机制，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反复、内乱、各派势力的争夺和国外的干涉乃至公开侵略，人民真正的参政如此难产，不都让古氏不幸而言中吗？

值得注意的是古德诺对列强的态度所作的坦率表述，即上文第五点，同时提出了中国为自救而必须激发人民爱国精神和加强政府力量之道，也算尽了言路。能不能做到，那就看中国人自己了。列强的这一态度，在上述马慕瑞的报告中已得到证实。

关键在于立宪（5）

四 梁启超的评论

古德诺的观点与梁启超不谋而合。1915 年八九月间梁启超发表的文章和答

记者问对这个问题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旁证。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是反对建立共和国，主张君主立宪的。而在 1915 年却坚决反对复辟君主制。在袁世凯假惺惺一再表示自己不称帝时，梁多次上书对他表扬，对“筹安会”诸公的论点进行尖锐的批判。实质上，他的主张前后并不矛盾。8 月 20 日发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全面阐述了他的观点，大意是：共和或君主是国体，宪政是政体。国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体。他当年反对共和是认为在现行国体下群策群力进行政治改革可能还有希望，而国体一经破坏，人民对新国体尚不适应，骤然蜕变，“其危险痛苦将不可思议”。自辛亥以来数年

间的事实已证实了当初的估计。现在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起，实在不理解也不能同意。有意思的是，梁启超还有一段话，他说，古氏所作各国政体的比较，以及抽象地论君主、共和之得失等诸论点其实很浅近，本人早已有大量论述，可以说古德诺是“无意中与我十年间旧论同其牙慧”，但是现在这么浅近的道理“忽借一外国人之口以为重”，“独惜吾睛不蓝、吾髯不赤，故吾之论宜不为国人所倾听耳”。君主、共和的利弊问题应该讨论的是辛亥革命之初，那个时候“诸公安在”？现在时机已过，主要是“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用大白话说就是“经不起折腾了”。关键还在于是否实行宪政：

“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这是他的意见的实质所在，因此先反对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称帝并非前后不一致。古德诺的主张实质上也差不多，不过他没有明确反对回到帝制，而是提了一些条件。他是外国人，这样做也有其分寸。梁启超对于“筹安会”所说古氏主张恢复君主制表示一定的保留，在文中加了一个注：“古氏与某英文报记者言，并未尝有此主张。”在9月4日答英文《京报》记者问中，梁又提到古氏的论调自己早已说得“焦唇蔽舌，而国人莫余听”，现在这位外国博士所述只得其半，而“臭腐忽为

神奇，相率以研究之”。可见得梁氏对当时重洋轻华之风是十分愤慨的。（顺便说一句题外的话，笔者不敢攀附先贤，但对学术界此风却至今屡有同叹。）看来那时梁已读过古氏《备忘录》的全文，他对于复辟三条件中的第一条：不遇到强有力的反对，认为到了国体必须变更之时已无反对之余地，只有“乘机徼利借口生事之乱党”才会昌言反对。因此他比较悲观，以为复辟能够实现，然后又要引起一片混乱。事实证明这点他又估计错了，最后连他自己也加入到了讨袁的行列中。

五 “筹安会”与古氏的关系古德诺在提交《备忘录》之前是否已经知道袁有称帝意图，已不可考。因为直到那时为止，

袁世凯的公开表态还是坚决不当皇帝的。但是从古氏《备忘录》的内容来分析，不见得毫无所知，至少有一股主张恢复君主制的势力他是知道的，否则“从共和回到君主”的命题从何说起呢？不过，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窃以为，古德诺不见得看不出来，以当时中国之乱，派别林立，他所提出的条件很难做到，袁世凯作为大总统办不到的事——不论是统一中国还是立宪——难道一当上皇帝就能办到？如果他有意鼓励袁称帝，就不必气急败坏地大张旗鼓地加以澄清。因为他的澄清是在“筹安会”声明一发表之后立即进行的，是在当时列强估计袁有可能成功之时，不是在讨袁运动兴起之后。不过，

他的《备忘录》是在那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应袁世凯之请提出的，明确提出君主制更适宜于中国，尽管是做理论上的阐述，不可能不被袁所利用，这点除非他真的是书呆子，本应估计到。

关键在于立宪（6）

严复、杨度诸君子都是饱学有识之士，他们的爱国热忱不容人怀疑，在他们探求救中国之道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在这件事上证明是错了。但是，在当时他们各自一定是经过一番思考的，有其自成逻辑的思路，不可能是受了洋人一篇文章的蛊惑。其中严复最德高望重，对西学研究最透，主张变革最力。他的一贯思想比较清楚。与这件事有关的主张，简言之就

是：中国之患在于愚、贫、弱，而三者之中“尤以瘠愚为最急”，所以根本在于发展教育，开启民智。“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这是他的名言。对于西学，他认为首先应学习科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然后再实行政治变革，否则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他在思想上引进西学，比康、梁更激进，而在政体变革上却主张缓行。他明确主张君主立宪，但谴责康、梁戊戌变法的做法是“卤莽灭裂，轻易猖狂”，结果是“幽其君而杀其友”，自己倒逍遥海外。依了严复，西太后天年易尽，到那时光绪政权独揽，徐起更张，就能顺理成章地变法成功。对于辛亥革命，他当然反对，理由这里不再

详述。值得一提的是，他特别反对把矛头指向满族，认为这必然引起民族分裂，而中国之败，汉人也不能辞其咎。这点，孙中山后来也改正了。到“筹安会”成立时，根据严复自称，他是被杨度强拉进去的。严表示自己是赞同君主立宪，但是谁来当这个君主，绝对是个难题。显然他并不拥戴袁世凯，对此事尚有所犹疑。但是杨度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第二天就把他的名字列入了公布的名单。帝制失败后，严复说，他当时没有断然发表声明表示否认，以后也就不好再辞其责。但是他仍认为“弃共和而就君宪尚未大差”，错在有人自矜手腕，想做到一致赞成，给反对派以可乘之机，是非常失策的。他还认为袁之

失败不在于他称帝，而是在此以前已经有一系列过失，因而不得人心。但是当时的中国，舍袁无旁人可以领导，因此他也不肯参加劝袁退位的行列，反而认为如果袁世凯还有良心就该毅然负起收拾局面的责任来。可见严复主张君主制立宪是一贯的，在先后有关这一事件的种种论述中，未见他提到过古德诺的名字。

逝者已矣。在一百年前的中国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仁人志士纷纷探求救国之道，各自都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思路，其中都有合理的成分。很难简单地说主张君主立宪就一定反动，主张立即实现共和制就一定进步。如梁启超、严复等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激进”，在那个问题上又显得“保守”，

有他们自己的思想逻辑，并不那么不可理解。不论国体如何，关键在于立宪，而要实行政治改革，开启民智先于一切，这在原则上都没有错。问题在于，当时的形势不允许按部就班、好整以暇地进行改良，理由已如前述。这是中国人民的不幸。无论如何，开启民智这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孙中山先生提出在建立共和国后有一个“训政”期。问题不在这“训政”期有多长，而在于如何“训”。可惜的是，中国在“共和”的名义下，掌权的人物绝少向着民主、宪政的方向去“训导”人民，更多的是相反，生怕民众被外来思想启发出要自由要民主的觉悟，而实行愚民政策，至使“开启民智”一直是任重道远，实行

民主的条件迟迟不够成熟，这是怪不得洋顾问的。事实是，在古氏《备忘录》之前，“筹安会”诸公基本主意已定，在梁启超为之痛心疾首的崇洋风气之下，抬出洋博士来可以多一个说服国人的有力依据，这是很自然的。在这个意义上，毋宁说古德诺是被利用的，不过至少严复与他无关。

（1998 年）

此电子书由习之网 www.5sgou.com 搜集于互联网. 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 如要支持作者, 请购买正版